



# Peace-cooperativism: Constructing a “Theory of General Security”

Yu Xiaofeng

**Abstract:** After the Cold War, all kinds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both within and beyond national borders—are emerging one after another. These various threats have formed a comprehensive, multi-dimensional and long-term challenge to human security. At the same time, the concepts of “human security” and “overall national security” have been put forward, which highlights that “General Security” has already become a point of consensus for both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l Security”,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is a kind of “species security”, emphasizing “field security”, including individual, collective and human security, and further national security as well as human, social and global security. “General Security” extends the meaning of “security” on three dimensions. The first is to magnify the referred objects by transcending the notion that “national security” is the only basic unit or sole center of security. The second is to expand the relevant fields of security, and include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which traditionally occupied a “low politics” position, in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da. The third is to integrate different core values that underpin security, forming a composite of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security and justice,” “security and freedom,” and “security and emancipation.” The idea of “Peace-cooperativism” originates from “Baohe Taihe,” which is a concept from the Chinese classic text Zhouyi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realizing “General Security.” Ancient Chinese sages viewed the world from the ontological standpoint of “holism,” and formed overall view of existence including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ian Ren He Yi), “all under heaven” (Tian Xia Wu Wai), and “the way of heaven and human nature” (Tian Dao Ren Xing). They also constructed paths for “world harmony” (Tian Xia Da Tong) and “universal peace” (Wan Guo Xian Ning), by using the methodology of “Yin and Yang”, “moderation” (Zhong Yong) and “harmony” (He Xie). China has the earliest “alliance” system in the sens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earliest “tribute” system in the sense of “integration of civilizations”, the unique “character” mode in the sense of “elemental integration,” and also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ystem based on the notion that “the whole is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parts.” If “peace-cooperation” (He Xie) and “moderation” (Zhong Yong) are the most classical summaries and expressions of the Chinese way of life, then “peace-cooperativism” is the core value of the notion of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currently being pursu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Peace-cooperativism” aims at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ies”, so that countries can not only replace the “fences” with the system, the norms and identities fication, but also achieve the aims of “amity, sincerity, mutual-benefit and inclusiveness” through “co-construction” “co-creation” and “sharing,” further achieving a “harmonious world”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le security.” An exploration of the “peace-cooperativism” concep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Theory of General Security” attemptsto redefine ontological and methodological bases for security studies.

**Keywords:**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peace-cooperativism; theory of General Security

**Author:** Yu Xiaofeng,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graduated from Zhejiang University in 1982, and received Ph.D. degree from Jilin University in 1996. He is now the director of Center for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and Peaceful Development Studies in Zhejiang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philosophy, ethics and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10 academic works including *Philosophy of Personality*, *The Realm of Personality: An Introduction to Species Ethnics*, *Comparative Administration System: The Application of Political Theory, Eth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and Public Crisis Management*, *An Introduction to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and Public Crisis Management*, etc.

# 和合主義：“廣義安全論”的建構與可能

余瀟楓



**[摘要]** “冷戰”結束以來，高於國家層次和低於國家層次的各類非傳統安全威脅層出不窮，並形成對人類安全的全方位、多層面、長時段挑戰；而“人的安全”“總體國家安全”概念的相繼提出，則標誌着“廣義安全”已經成為國際社會與中國政府的共識。“廣義安全”視角下的非傳統安全是一種“場域安全”意義上的“類安全”，既包含個體安全，也包含集體安全與人類安全；既包含國家安全，也包含人的安全、社會安全、全球安全。它在三個維度上對“安全”進行擴展：一是在指涉對象維度上深化，超越了“國家安全”作為唯一的基本單元或中心；二是在領域設定維度上拓展，使低政治的非傳統安全領域進入國家安全議題之中；三是在價值整合維度上融合，使“安全與發展”“安全與正義”“安全與自由”“安全與解放”成為安全理論研究的複合性議題。源於《周易》“保合太和”理念的“和合主義”，是實現“廣義安全”的理論基礎。中國古代先哲以“整體論”的本體論立場“觀世界”，形成了“天人合一”“天下無外”“天道人性”的總體存在觀；又以“陰陽”“中庸”“和諧”的方法論視角建構“天下大同”“萬國咸寧”“太安康平”的現實路徑。中國有最早的“國際關係”意義上的“會盟”制度，有最早的“文明融合”意義上的“封貢”體系，有獨特的“要素整合”意義上的“文字”模式，還有貫穿“整體大於部分之和”思想的“中醫”系統。如果說“和合”“中庸”是中國人生存方式的最經典的概括與表達，那麼“和合主義”則是中國人的“命運共同體”追求的最核心的價值內核。它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標，使國家之間不僅可以通過制度、規範、認同來取代“籬笆”，而且還要通過“共建”“共創”“共享”來達成“親、誠、惠、容”，來實現“可持續發展”與“可持續安全”的“和諧世界”。探索“和合主義”體系與建構“廣義安全論”，目的是為研究安全問題重新設定本體論與方法論基礎，進而走出一條中國參與世界、導引世界的安全治理之路。

**[關鍵詞]** 非傳統安全 和合主義 廣義安全論

**[作者簡介]** 余瀟楓，1982年畢業於浙江大學，1997年在吉林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現為浙江大學非傳統安全與和平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哲學、倫理學、非傳統安全理論研究，代表性著作有《哲學人格》《人格之境：類倫理學引論》《比較行政體制：政治學理論應用》《國際關係倫理學》《非傳統安全概論》《非傳統安全與公共危機治理》等。

“冷戰”結束以來，高於國家層次和低於國家層次的各類非傳統安全威脅層出不窮，並形成對“人的安全”全方位、多層面、長時段的挑戰；包括中國在內，許多國家同時面臨着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經濟發展與社會安全、國家安全與人的安全和社會安全相互纏繞交織的複雜形勢；特別是面對種種不同形式湧現的“非傳統安全危機”，各國從理念、法律、體制、隊伍到條件都出現了嚴重不適應，以至呈現出理論、決策、實施等方面能力的不足。由於全球性的非傳統安全挑戰已成為人類社會的“生存性焦慮”與各國發展方略制定的“本體論依據”，2017年，歐洲出版了兩本書：《歐洲的怪死：移民、認同與穆斯林》<sup>①</sup>《歐洲的終結》<sup>②</sup>，均從非傳統安全挑戰的角度探討歐洲是否能度過難關；中國也有學者預言，未來十年主要的挑戰是非傳統安全<sup>③</sup>。在這一背景下，防範、應對、化解非傳統安全挑戰給人類帶來的“灰犀牛”危機，就需要根據非傳統安全的性質與特徵，建構“廣義安全論”與非傳統安全研究的理論範式。這既有助於在本體論、方法論上明確新的研究視角，也有助於在治理方略和策略上明確其核心價值取向與轉換思維模式。

## 一 “廣義安全”語境下的“安全理論”困境

“全球化”這一新模式促進了各國各種要素的開放、流通與共享，交通便利、經濟互通、資源交換、文化交流使得人類社會特別是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進入了發展的快車道。但它也帶來了許多僅靠一國難以應對的跨國性安全威脅，如公共衛生安全危機使得全球“因病相連”，經濟金融安全危機使得“一國生病，多國吃藥”，氣候變暖與生態危機使得人類面臨嚴峻的“代際不安全”風險；而主要由傳統安全轉化而來的難民危機，更使得歐洲為主的許多國家進退兩難。同時，國家之間與國家內部的諸多非傳統安全問題也層出不窮、相互交織，傳統應對安全危機的方式十分乏力。如何有效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的挑戰，成為近些年各國決策者與學者考慮的戰略性重大課題。

在人們以往的視域裏，國家“安全”的層面主要是指狹義的軍事安全、政治安全領域，而如今則擴展到了廣義的經濟安全、社會安全、環境安全等領域，“國門安全”越來越多地被跨越國門的非傳統的“場域安全”所取代。對於人類個體來說，安全也從“傳統”擴展到“非傳統”，即追求沒有戰爭的和平遠遠不夠，和平不等於安全的全部；追求經濟的發展遠遠不夠，發展也不等於安全，甚至許多不安全恰恰是發展本身所帶來的。它意味着，傳統的安全行為體、安全指涉對象、安全維護範圍、安全維護方式已出現重大“擴展”，傳統的安全維護立足點、安全治理側重點已出現重要“轉化”。這就對安全的理論研究與現實治理帶來了從未有過的挑戰。

如果說20世紀90年代初，聯合國提出的“人的安全”概念是“安全”從狹義拓展到廣義的重要標誌的話（因為，“人的安全”內含經濟安全、糧食安全、健康安全、環境安全、人身安全、共同體安全、政治安全七大方面），那麼，21世紀第二個十年初，中國提出的“總體國家安全”概念則是“國家安全”從狹義走向廣義的重要標誌（因為，“總體國家安全”包括有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十一個方面）。與此相應，以往的與邊防相關的“邊境安全”，擴展到了與邊境相關聯的邊疆安全與跨境的區域安全；以往的與出入境檢驗檢疫、海關等部門相關的“國門安全”，擴展到了需要內伸、外延、中轉、互聯、應急、反恐的多維度的“場域安全”；甚至以往難以相互關聯的事件，可能會通過互聯網的傳導成為“網絡安全”危機。所以，“廣義安全”正在成為國際社會與各國領導人的新共識。

① Douglas Murray, *The strange death of Europe: immigration, identity, islam*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2017).

② James Kirchick, *The end of Europe: dictators, demagogues, and the coming dark a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③ 金燦榮：“未來10年的世界大變局”，《觀察者網》(<http://www.guancha.cn/>)•觀天下講壇》，2017-08-01。

“廣義安全”的共識，使得無論是學術界還是決策者都需要主動跳出單一、線性、局部的立場，而從複合、非線性、整體的“場域安全”立場來看待當今的安全，即“安全不僅是一種狀態，還是一種條件、能力與願景；安全不僅是一種事件，還是一種趨勢、互動與建構；安全不僅是一種情勢，還是一種關係、結構與話語”<sup>①</sup>。

由於“安全”概念已從“傳統”擴展到“非傳統”，那些傳統的關於安全的理論範式，相對於非傳統安全的挑戰往往難以適用。例如，非傳統安全威脅所表現出的跨國性、複合性，對於“有好籬笆纔有好鄰居”的現實主義構成挑戰；事實上，面對國際恐怖主義威脅，國家之間需要拆籬笆而協同應對。又如，面對氣候變暖導致地球生態惡化，國家之間需要摒棄“零和博弈”而攜手共治。同時，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延展性、連帶性，也挑戰“有好制度纔有好鄰居”的自由主義。英國脫離歐盟、美國退出《巴黎協定》等“逆全球化”新動向，都是對自由主義“相互依賴”的現實諷刺。如果說傳統安全困境是“零和博弈”式的“軍備性安全困境”，那麼，非傳統安全困境則是“非零和博弈”式“資源性安全困境”。這使得傳統安全的理論範式已與時代嚴重脫節，需要建構新的理論範式來描述、解釋、規範、預構現實，為人類走出非傳統安全困境提供理論支持。

## 二 和合主義的“類群—和合”假定與“安全拋物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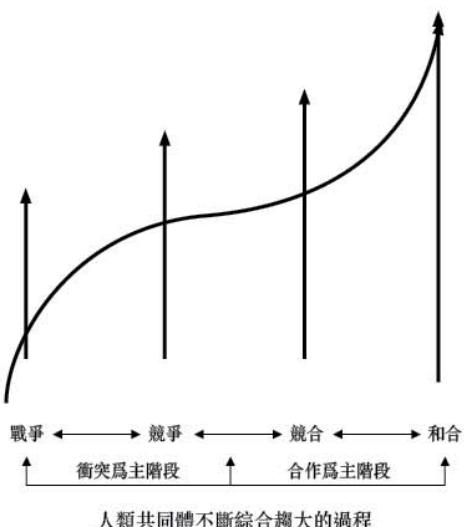
德國思想家馬克思（K. H. Marx, 1818—1883）在研究人的歷史與人的解放時發現，人是類的存在物，人具有“類”性，人從自在、自發到自主、自為，再到自由、自覺，是人的類性的不斷遞進的過程。人類在進化過程中從動物鏈中分化出來，擺脫了以往的“種群”的規定性，呈現出了人類社會獨有的“類群”的規定性。如果說“種”的本質是先天的、複製的、直接傳承的，那麼“類”的本質是後天的、再創的、不斷生成的。<sup>②</sup>因而，人體現類性的生存是一種“類生存”，人的價值是一種“類價值”，人的安全是一種“類安全”。

從“類安全”這一廣義的安全視角來審視人類社會，可以發現人類安全在共時態、歷時態中的總體特徵和演化特徵。從共時態來看，人類作為具有“類群”規定性的類存在物，是“共生”“共存”“共建”“共享”的。再從歷時態來看，

人類社會不同歷史階段恰恰是“類安全”不斷生成、演化的現實表達。儘管人類在自身發展中出現了無數次局部衝突、戰爭乃至世界大戰，但不可否認的是，人類一步步從部落、部落聯盟，到國家、國家聯盟、超國家共同體且正走向更大的“命運共同體”。“共生”“共存”“共建”“共享”的共時態特徵與“共同體演進”的歷時態特徵表明，衝突祇有相對的意義而非人類的總體本質，“類群和合”纔是人類的總體本質。

以“類安全”為本體論立場，根據人類衝突與合作的類群發展歷程，可以畫出一條沿着“衝突與合作”或具體展開為“戰爭—競爭—競合一和合”的回落與上升的“安全拋物綫”（見圖一）。這一安全拋物綫，表明了人類以“類群和合”為必然本質的歷史

圖一 廣義安全拋物綫模型



① 余瀟楓：“重塑‘安全文明’：非傳統安全研究”，《國際政治研究》6（2016）：140。

② [德]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第42卷，第95頁。

走向，從而為“廣義安全論”的建構提供了理論依據。

這一拋物線可以分為兩段，“下拋物線”（左下邊的上升部分）是衝突為主階段，其中又在總體上分為“戰爭”與“競爭”兩個階段；“上拋物線”（右上邊上升部分）是合作為主階段，其中又在總體上分為“競合”與“和合”兩個階段。在和合之前的“競合”，是既競爭又合作，是和合的基礎性階段或初級階段。

人類在初級階段，主要的交往方式是群體內的和合與群體間的衝突，衝突分為極端形式的戰爭與非極端形式的競爭。人類經歷了兩萬多次大大小小的戰爭，兩次世界大戰是人類戰爭的頂峰。儘管人們還面臨着可能有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以核武為標誌的人類自我毀滅性的戰爭），但人類總體上在“戰爭—競爭—競合—和合”的安全拋物線上不斷地往和合的方向發展。這一上升趨勢可由人類社會的幾次重大變故得以證明：一是蘇聯解體是“冷戰”以和平方式結束的一種非戰爭結束；二是歐盟的努力已經使入盟國家間消解了“邊境困境”、蒸發了“邊疆問題”，所以歐盟內的國家間戰爭將無從談起；三是東盟經過五十年的努力，使得曾經是“戰亂與貧困交織”的亞洲進入了一個以“協商式安全”為特徵的和平與發展為主流趨勢的良好時期。

“安全拋物線”表明的是人類安全發展的總體趨向。相對於某一地區或國家，其安全拋物線的樣式可以是各種各樣的，“戰爭—競爭—競合—和合”之間不排除有交叉重疊以及反向升降等。在不同歷史階段、不同地區與國家間，往往有衝突與合作、戰爭與和平之間的循環，還有如戰爭與競爭的循環、競爭與競合的循環、競合與和合的循環等；但是，這並不影響人類社會的“類安全”總體趨向以及不斷整合為更大的命運共同體的走向，人類的“廣義安全”是隨着人類從野蠻走向文明而且從衝突走向和合的。

“類群—和合”特性與“廣義安全拋物線模型”是“和合主義”的重要前提性假定。人類社會“類安全”不斷從“衝突”走向更大範圍“和合”的趨向，不僅僅是一種客觀必然趨向與行為體應然趨向的複合，而且更是一種行為體間的共同建構的“適然趨向”的升級。<sup>①</sup>“適然”是對“必然”與“應然”的再複合，是非客觀非主觀且又整合客觀與主觀的“廣義安全”的本質特性。和合主義便是這種“廣義安全論”的理論表達。

### 三 作為非傳統安全理論範式的“和合主義”

“廣義安全”視角下的非傳統安全是一種“場域安全”意義上的“類安全”，它既包含個體安全，也包含集體安全與人類安全；既包含國家安全，也包含人的安全、社會安全、全球安全。“廣義安全”是對“安全”在三個維度上擴展的結果：一是在指涉對象維度上的不斷深化，使“國家安全”作為唯一的基本單元或中心被超越；二是在領域設定維度上的不斷拓展，使低政治的非傳統安全領域進入了國家安全的議題之中；三是在價值整合維度上的不斷融合，使“安全與發展”“安全與正義”“安全與自由”“安全與解放”越來越成為安全理論研究的複合性議題。和合主義作為非傳統安全理論範式，為“廣義安全論”確定了價值取向。

“和合主義”理論範式的確立是“廣義安全論”確立的前提。和合主義要超越傳統的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就離不開對安全研究作本體論、方法論的思考與轉換，特別是離不開對“安全”作為一種特定話語方式的理論建構。從研究“和平”演化而來的後結構主義安全研究，對“話語分析”與“話語安全”理論做出了歷史性貢獻。“話語分析”使安全被置於了互文性的結構性解讀的語境中，而“話語安全”是完全不同於“客觀安全”“主觀安全”的重要範疇。在後結構主義的“話語”觀看來，“安全”不是一個像“威脅”可以被評估的“客觀概念”，而是一個如“主體”可以被建構的“安全實踐”。行為體安全與否或是否面臨威脅，不是自在“客觀的”，而是

<sup>①</sup> 中國學者楊潔勉提出的共生性國際體系的“和平共處，和平共生，和諧共生”三階段理論，同樣表明了“廣義安全”之“適然趨向”的上升特徵。

由安全話語“建構的”，甚至“威脅”本身也是一種特定的話語。客觀性的、物質性的事物總是通過人們對它的認識與解釋被以各種不同的話語方式表達出來的。這話語不是“客觀的”而是“建構的”，也不是“主觀的”而是與客觀相關聯的。因此，把某事物置於會帶來嚴重危害的緊迫性之中，該事物就被建構成了“威脅”；把某國家置於與危害相關聯的特定“身份”之中，該國家就面臨了“威脅”。

可見，話語安全分析對“和合主義”建構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現實主義認為“有好籬笆纔有好鄰居”，於是物質性的籬笆與防籬笆被入侵的軍備成爲要務。自由主義認爲“有好通道纔有好鄰居”，於是以相互依賴爲前提的國際制度成爲要務。建構主義認爲“有好規範纔有好鄰居”，於是物質性的籬笆與防籬笆被入侵的軍備都不重要，而國家間認同的一致性成爲要務。與“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建構主義”理念不同的是，和合主義認爲“有好關係纔有好鄰居”，這裏“關係”強調的不是行爲體本身，而是強調行爲體之間的互動。因而，在“和合主義”視域下，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爲目標，國家之間不僅可以通過制度、規範、認同來取代“籬笆”，而且還要通過“共建”“共創”“共享”來達成“親、誠、惠、容”，來實現“可持續發展”與“可持續安全”的“和諧世界”。

“和合主義”的思想源自《周易》，形成和發展源自中國人的歷史實踐。和合主義的核心概念“和合”，源自《周易》的“保合太和”理念。《周易》中的“保合太和”是強調“和合”的永恆並追求永恆的“和合”。與此相應，中國古代先哲以“整體論”的本體論立場“觀世界”，形成了“天人合一”“天下無外”“天道人性”的總體存在觀；又以“陰陽”“中庸”“和諧”的方法論視角建構“天下大同”“萬國咸寧”“太安康平”的現實路徑。中國有最早的“國際關係”意義上的“會盟”制度，有最早的“文明融合”意義上的“封貢”體系，有獨特的“要素整合”意義上的“文字”模式，還有貫穿“整體大於部分之和”思想的“中醫”系統。如果說“和合”“中庸”是中國人生存方式的最經典的概括與表達，那麼“和合主義”則是中國人的“命運共同體”追求的最核心的價值內核。

和合主義理論體系中的重要概念有“優態共存”<sup>①</sup>“共享安全”<sup>②</sup>“場域安全”<sup>③</sup>“安全鑲嵌”<sup>④</sup>“安全文明”<sup>⑤</sup>“非傳統安全共同體”<sup>⑥</sup>“非傳統安全外交”<sup>⑦</sup>“選擇性安全化”<sup>⑧</sup>“多元多邊與多元雙邊合作”<sup>⑨</sup>等。以“優態共存”爲例，它爲和合主義提供“適然安全”的理論內涵。何種狀態是人類社會的真正安全狀態？在國際關係領域，人們對“安全”的基本共識是：“客觀上沒有威脅，主觀上沒有恐懼，主體間沒有衝突。”當然，這是一種較理想的狀態，因爲無論是客觀還是主觀抑或是主體間，沒有威脅、恐懼、衝突祇是相對的。人類的生存環境可以無限地放大，客觀威脅也就無法限定，主觀恐懼就無法終止，況且矛盾運動是事物發展的本質，“主體間沒有衝突”也就祇是一種理想狀態。但沒有絕對的安全，並不意味着“相對安全”不能達到或沒有意義，甚至一種“相對的‘絕對’安全”纔是人類社會的適然性安全境界。

尋求“適然性安全境界”是建構“廣義安全論”的目的所在，也是和合主義的價值依據所

<sup>①</sup> 余瀟楓：“從‘危態對抗’到‘優態共存’：非傳統安全戰略的價值定位”，《世界經濟與政治》2（2004）；余瀟楓：“安全哲學新理念：優態共存”，《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2005）。

<sup>②</sup> 余瀟楓：“共享安全：非傳統安全研究的中國視域”，《國際安全研究》1（2014）；余瀟楓：“‘共享安全’：非傳統安全新範式”，《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2014）。

<sup>③</sup> 余瀟楓、趙振拴：“從‘國門安全’到‘場域安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sup>④</sup> 余瀟楓、周冉：“安全鑲嵌：構建中國周邊信任的新視角”，《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2017）。

<sup>⑤</sup> 余瀟楓：“重塑‘安全文明’：非傳統安全研究”，《國際政治研究》6（2016）。

<sup>⑥</sup> 余瀟楓、王夢婷：“非傳統安全共同體：一種全球治理的可能路徑”，《國際安全研究》2（2016）。

<sup>⑦</sup> YU Xiaofeng, Imran Ali Sandano,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Diplomacy: A Workable Option for India and Pakistan to Move Forward”, *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2 (2017) : 313-330.

<sup>⑧</sup> 余瀟楓、謝貴平：“‘選擇性’再建構：安全化理論新拓展”，《世界經濟與政治》9（2015）。

<sup>⑨</sup> YU Xiaofeng, Ruth Kattumuri, “Dragon and Elephant, Shoulder to Shoulder: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1 (2017) : 21-43.

在。為此，這裏給出一個廣義“安全”的定義：“安全是行為體間的優態共存。”廣義的“行為體”，是指世間一切對安全產生影響的施動者，包括自然的行為體與人的行為體兩大類。人類社會自身的行為體包括個體、群體、國家、國際組織等。“優態”是與“危態”相對立的範疇。“危態”指危機狀態，即衝突、對抗、互傷互害為特徵的不安全狀態；而“優態”是指危機消解狀態或危機可控狀態，廣義上“優態”是一種以和平、合作、互惠互利為特徵的安全狀態。“共存”則是對“共時態”的共生、共有、共創、共享特徵的認可與踐行。“行為體間的優態共存”作為廣義的安全界定，表達的正是一種典型的“和合”狀態的適然追求。“和合”比“和平”“和解”的層次要高：“和平”祇是沒有戰爭，“和解”祇是沒有衝突，“和合”則是在沒有戰爭和沒有衝突之上的多樣、各方、全面的合作。這種和合不是無視或否論衝突與戰爭，而是適然地來建構超越衝突與戰爭的安全世界。以“優態共存”來界定廣義安全或非傳統安全，“安全的可能性邊界就拓展到了安全建設的雙方甚至是多方，安全就有了某種絕對的意義，進而標示出了安全所要達到的更廣泛深遠的價值目標”<sup>①</sup>。

#### 四 “和合主義”的理論實質與前景

作為一種具有普遍包容價值內涵的中國式的“世界主義”，“和合主義”是一種在國際關係與國際安全研究中的中國話語、中國範式、中國實踐的理論探求。它與西方的國際關係和非傳統安全理論範式相比較，有着以下三方面特點。

其一，在“廣義安全論”的視域中，用“和合主義”觀照非傳統安全理論的研究，意味着研究安全的“問題域”“認識論”“變量結構”“實現路徑”等將實現歷史性的重大轉換。也就是說，“問題域”從高政治轉向了“低政治”，或把“低政治”問題安全化為“高政治”；“認識論”從強調客觀的物質主義、科學主義、經驗主義與強調主觀的理念主義、歷史主義、先驗主義轉向了強調對文化話語作互文性解讀的“適然主義”；“變量結構”從描述性和解釋性狀態轉向分析性與規範性狀態；“實現途徑”從“客觀威脅”與“主觀恐懼”的被動消解轉向了“主體間和合”的主動尋求與“適然安全”“共享安全”“鑲嵌安全”的優先確立。

其二，“和合主義”在應對和解決“非傳統安全”問題上有着更為廣闊的前景。西方非傳統安全理論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安全指涉對象”從“國家”轉向為“人類”“社會”“性別”，“安全研究領域”從軍事與政治擴展到了經濟、文化、社會與環境，“安全實現路徑”從權力、利益的絕對獲得轉向規範、制度的相對約定，“安全與主權關係”從重視絕對主權轉向重視相對主權與責任主權，“安全與發展的關係”從安全與發展相分離轉向安全與發展相融合的可持續安全觀；由此，形成了建構主義的“安全互構說”，女性主義的“性別安全說”，哥本哈根學派的“安全化理論”與“認同安全說”，後殖民主義安全研究的“非西方安全說”，後結構主義的“話語安全說”，以批判安全研究的“人的安全理論”與“解放安全說”。但是，西方非傳統安全理論研究的本體論與方法論缺陷也十分明顯：一是在本體論上總是還原為“原子主義”，重視行為體的“單位”性而輕視由“單位”建構起來的體系的“關係”性；二是在方法論上總是陷入“二元對立”，難以超越行為體衝突消解過程中的非此即彼模式；三是在價值論上總是跳不出“西方中心主義”立場，把不符合西方價值標準的國家視為“破碎國家”“獨裁國家”“無賴國家”等，致使西方國家特別是西方某些大國總是跳不出“冷戰”的思維局限，面對國家間的“異質性”的衝突找不到良策，個別西方大國甚至迎合民粹主義的思潮，積極為“逆全球化”推波助瀾。

其三，和合主義也是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提倡與踐行的體現中國話語的理論範式。從中國提出“和平發展”方針，構劃“和諧世界”建設，到開創“結伴外交”，推進“一帶一路”倡議，再到提出“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和走向“人類命運共同體”，都是“和合主義”這一“中

<sup>①</sup> 余瀟楓：“重塑安全文明：非傳統安全研究”，《國際政治研究》6（2016）。

國範式”在當下的全球運用。可以說，中國作為新興大國的崛起面臨諸多的安全困境，周邊“噪音”此起彼伏，遠處大國陽奉陰違，安全形勢大有“四面疾風”“八面來敵”之境況。但中國政府“求和”“維和”“促和”的立場毫不動搖，“結伴”“合作”“共享”的路越走越寬。中國針對國際形勢的變化先後提出了“新安全觀”“亞洲安全觀”“總體國家安全觀”，甚至歡迎其他國家來“搭”中國發展的“快車”，號召世界各國共同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正是中國通過建立國家之間各類型的“結伴”關係，拓展區域之間以新的國際組織為紐帶的“合作”關係，逐步實現了以“和合”為目標的“安全結構鑲嵌”“安全制度鑲嵌”和“安全文化鑲嵌”，使得以“國際安全為依託”的環境大大改善，使得以“和合主義”為價值核心的“廣義安全論”在現實中成為可能。

### 結語

中國在國家層次上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是安全從狹義轉向廣義的重要安全實踐；在國際層次上提出“共同安全”“綜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續安全”等，是當今人類試圖超越“零和博奕”的更大範圍實現“廣義安全”的努力。這些努力，在“不同層次、不同範圍、不同程度上尋求與踐行着安全的某種‘共建’與‘共享’”<sup>①</sup>。尤其是中國提出共同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則從更廣義的角度來探索人類的發展與安全之路；而強調“類安全”是各國所有共同維護的首要，揭示“人類安全共同體”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題中之義。

這裏提出“廣義安全論”，並不排斥特定語境下的“狹義安全”。“廣義安全論”的建構祇是試圖凸顯“和合主義”的“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和合主義”超越了傳統安全的主體、議題、範圍與路徑，不僅把安全與發展關聯起來了，還把“安全與正義”“安全與自由”“安全與解放”關聯起來。以“安全與發展”關係為例，安全與發展是互為前提和條件的，但在廣義論的視角下，安全總是發展的前提、目的與實質。再以“安全與正義”的關係為例，和合主義不是“和稀泥”，而是隨時需要有強大正義的力量來面對不正義的邪惡，或者隨時需要有維護正義的勇氣來和解非正義的衝突。

總體而言，和合主義體現的是“廣義安全論”的核心價值，確立的是非傳統安全研究的理論範式。如果說安全研究中的後結構主義的挑戰“在於需找到一個‘安全’的替代性概念，並足夠靈活以解構僵化的‘國家安全’概念，允許那些與國家不相關的主體進入人們的視線，並確定一種區分模式以避免陷入單純的敵友劃分或全球無衝突的理想化陷阱”<sup>②</sup>，那麼，“和合主義”體系的探索與“廣義安全論”的建構則要為安全研究重新設定本體論與方法論基礎。它以“場域安全”為視界，使具有普遍意義的安全理論得以創新，關注和消解全球治理中的衝突與危機，並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宏願，推進安全結構、安全制度、安全文化相互鑲嵌的安全格局，試圖走出一條中國參與世界、導引世界的安全治理之路。

<sup>①</sup> 余瀟楓：“共享安全：非傳統安全研究的中國視域”，《國際安全研究》1（2014）：33。

<sup>②</sup> [英]巴里布贊、琳娜漢森：《國際安全研究的演化》（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余瀟楓譯，第155頁。